

群际态度与群际信念:耦合还是分离?*

管 健 方 航 赵 礼 陈姝羽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天津 300071)

摘要:群际态度是人们对于某一群体的喜欢或不喜欢,包括外显群际态度和内隐群际态度,它是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正负连续体的评价。群际信念是人们对某一群体特性的刻板印象。以往研究认为,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是耦合关系,相互影响,相倚存在。但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也存在分离性证据,即存在矛盾性和非统一性。为何形成耦合或者分离,文化定型论、群际态度补偿机制(低地位群体的创造策略、高地位群体的慷慨策略),以及认知差别等都成为调节性平衡点。探讨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的分离性关系和作用机制对于干预和消弭群际边界与群际冲突,缓和群际关系具有深远影响,可以支持其独立路径予以针对性干预方案。

关键词:群际态度;群际信念;耦合;分离;补偿机制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1)02-0149-06

1 引言

当人类迈向 21 世纪之后的第三个十年,随着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蔓延,透过公共卫生视野,更大范围的群际问题层出不穷,融合与撕裂、交往与碰撞、文明与本性、发展与停滞,人类从未如此感受到命运一体感,人类也从未如此面对群际的斯巴达克之剑,既欲求突破,又常会踟蹰不前。群际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密切关注。群际态度激活群际情绪,影响群际行为,因而对复杂的群际间的态度与信念的研究变得尤其重要,且亟待深化。“玩具熊是可爱的,所以我喜欢”“布娃娃是不可爱的,所以我并不喜欢”,这个逻辑概念是儿童熟练的,但成年人的社会是异常复杂的,很可能“你很好,但是我不爱你”或者“他并不好,但是我无法自拔”,因此态度和信念并不是简单的二分概念,涉及到群际层面则比人际层面更显复杂,也因而对现实影响更为深远。

群际态度(intergroup attitude)是人们对于某一群体的喜欢亦或不喜欢的感知,包括外显群际态度和内隐群际态度,它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正负连续体的评价,不是简单的正维度和负维度。群际态度是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包括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态度,它比人们可见和可感知的更为复杂。它可以是多维概念,包括情感维度、认知维度。群际态度从早期的单维双维模型发展为矛盾性群际态度,强

调认知元素可能的不一致性和冲突性。Kurdi 和 Banaji(2017)通过 6 个实验,6492 名被试,发现群际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态度依赖于共享社会表征。群际信念(intergroup belief)是人们对某一群体特性的刻板印象。例如通过跨群体接触而产生的认为对方群体温暖和亲和的感受是群际态度,而在持群际本质主义信念产生社会距离基础上形成的认知评价则是群际信念,如白人可能在态度上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他们并不否认犹太人勤劳、聪明、会做生意。群际态度是感性知觉,而群际信念是理性评价。群际信念与刻板印象、偏见、歧视存在一定关联。信念往往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独特特质,信念和短暂情绪状态不存在关联,但与稳定的知识维度互为因果,比如它可以与独裁主义或保守主义相关。群际态度是情绪维度,可动态随接触而发生改变,群际信念相对稳定独立,是情感、认知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是基于感性态度而形成的知识观念。

群际态度是诸如喜欢、尊重、厌恶等情绪,群际信念是对外群体的信念和评价。但是二者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分开的,那么什么时候是耦合,什么时候又会分离,其间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值得深掘。探讨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的关系可以为现实世界勾勒出群际表征的基本脉络,同时对于干预可以单独提出独立途径,以利于更好的消弭群际之间的边界和冲突,也将对群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7JZD043),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63192402),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ZB21BZ0220)的阶段性成果。

通讯作者:赵礼,E-mail:zhaoli@nankai.edu.cn。

2 来自群际态度与群际信念耦合性的证据

何谓耦合关系,即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相倚存在。如美国人对亚裔的喜欢和亲和偏好被认为是群际态度,而认为其勤奋、高智商被归因为特质的群际信念,前者是一般性的、主观性的,后者是概念性的、具体的、可评价的。在社会心理学视野中,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一般被认为是相关的。Kurdi 等(2019)发现,内隐群际态度中白人存在显著的内群偏好,内隐群际信念方面,白人群体将内群与更多的积极品质关联,而将外群与更多的消极品质关联,即在群体层面内隐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正相关,在个体层面内隐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也呈现正相关。可见,内隐群际态度是原因,群际信念是结果,内隐群际态度会驱动内隐群际信念,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存在正相关关系,由此说明两者存在紧密一致性。例如,当人们对黑人的好感增加时也会更加认同他们拥有的积极品质。实验研究发现,信念可以被态度驱动。由此一般性结论均认为,积极群际态度由积极群际信念驱动,而消极群际信念则激活消极群际态度。Heinze 和 Horn(2009)通过探讨群际接触与青少年对同性恋的态度,进一步解释接触对于接纳和容忍度高度相关,并证明群际态度与群际信念的吻合特质。Kurdi 等(2019)的研究通过语料库选取词向量中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表征群际态度,选取温暖和能力维度表征群际信念,进而发现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存在正相关,即群体态度可以正向预测群际信念,这为内隐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的耦合一致提供了新的证据。

3 来自群际态度与群际信念分离性的证据

群际态度,尤其是更为复杂的内隐群际态度是一种复杂的自动化心理过程,和群际信念一样,宏观稳定,微观动荡。如果二者是一种必然的相符相乘的耦合关系,必然使干预变得艰难而固步自封。但如果二者可以分离,或许可以为群际的弥合带来新的曙光。因而这一问题需要回答的是,首先是否可以分离,其次在何种情境下分离,即为何分离,得到了这些答案,便可以找到促进的积极路径。

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的分离,显然是存有十足的证据的。例如,白人对亚洲人可能是消极的外显态度,但并不影响白人认为亚洲人是聪明这一群际信念。又如,人们对老年人的态度是积极的,虽然他们认为老年人“老态龙钟”“垂暮之年”,但是老年人依然让人觉得“慈眉善目”“鹤发童颜”。刻板印象内容在不同群体中差异很大,例如美国人认为犹太人是成功但固执的,老年人是友好但过于依赖的,根

据刻板印象内容模型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 的热情(warmth)和能力(competence)维度,热情被认为是人际和群际间对自我和内部群体的态度,能力则扮演了一个包括智力和社会性技巧的角色,由此许多群体得到的是矛盾性评价,即在某一个维度上得到的评价低而另外维度相对较高,形成不同聚类群。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由不同路径导引,前者如“我喜欢黑人”,这是概念导引,后者如“我认为黑人充满了能量”,这是经验导引,有可能正面,亦有可能是负面。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的分离特性,表明它们的两种不同且独立的认知过程和认知产物,如果该预设成立,那么改变群际态度或者改变群际信念,择而其一都可能助力积极变化。群际态度被认为是评价性质的普遍价值归因,而群际信念被认为是对特质的归因,寻求两者分离的机制或许可以发现群际积极方向转变的曙光。Wohl 等(2015)通过 4 项实验发现,当认为群际信念是可以改变的情况下,被感知的群体可塑性通过测量和操纵,可以缓和巴勒斯坦被试对以色列道歉的反应,宽恕等积极反应也随着对认为群际可塑性的改变而提升了群际信任,这或许为走向和解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4 耦合亦或分离的机制

是什么影响耦合还是分离?如果有分离存在,是在什么条件下完成,这不仅令人着迷,也是面对现实问题亟待深入了解的突破点。

4.1 文化定型

文化是社会或群体成员所持有的共同的思想模式、价值模式和行动模式,它是习惯的、累积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文化定型以认知简化为图示,对群体特征进行综合性归类,它是文化认知和文化互动的基准。人们对群际信念常常依赖于文化定型,而并非实际个体或群体成员的具体态度。在此方面,刻板印象内容模型提供了一种思路,即群际信念和群体态度可以相分离。由此通过实验操纵方法可以发现,操纵群际态度可以使温暖变量变化,或者能力维度加以变化。例如,精神疾病污名更是显现出群际信念和群际态度基于文化差异的影响,南亚人比英国人对精神疾病展现更多愤怒和危险感正是来源于文化的认知(Ahmed et al., 2020)。文化定型不仅发生在家庭内部,也可以广泛地存在于社会背景中,甚至进行代际的传递。文化定型将群际信念内化并使得个体展现出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这种典型和规范性的反应成为共享的群体内社会习俗,并形成文化刻板印象(cultural stereotype),而打破基于原有

的文化定型而产生的群际信念则有助于弥合群际关系。

4.2 补偿策略

群体认知期待一致和统一,矛盾正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信念,若要获得平衡,最好的方式是通过一系列补偿性策略来达成。面对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的矛盾性,补偿性认知策略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补偿性策略包括同化(assimilation)、顺应(accommodation)、确认(affirmation)和创造(creativity)。其中,创造策略是产生一些对自身有价值或有意义的事物作为重新评价的标准,以此来对抗矛盾态度的无意义感。群际态度的补偿效应可以显现态度和信念的分离,补偿效应旨在从温暖和能力维度出发重新感知预设群体。群体态度都显现在两个维度,即温暖与能力维度上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认知,Yzerbyt 和 Cambon(2017) 将其命名为社会创造策略(social creativity)和宽宏大量策略(magnanimity)。

4.2.1 群际交互方低地位的创造补偿策略

在补偿策略下,群际间都因为找到了平衡点而对本群体地位加以接纳。群际补偿(inter-group compensation)是群体成员在社会感知的基本维度,即能力维度和热情维度中将内群体感知为积极,外群体感知为消极,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将外群体感知为积极,内群体感知为消极的现象。例如虽然穷人认为个人财富积累能力弱,但是会强化“小富即安”“安贫乐道”的愉快体验,反而会同情富有者辛苦打拼的巨大苦恼;居住乡间的农夫虽然无法感知现代化生活的巨大红利,但是会秉持空气清新和悠然自得的田园心态,强化城市中的污染和拥堵。种种创造性补偿策略是拒绝歧视的最好武器。因此,社会创造策略是低地位群体的补偿路径,它旨在重建低地位群体的积极社会认同和自尊,这一策略可以通过创设积极的群际特异性,而对抗另一个维度的自尊威胁。人们在一个维度上不具信心的话,则会强化另外一个维度的独特性,由此低地位群体会使用模拟社会创造力的策略来避免自尊困扰。

4.2.2 群际交互方高地位的慷慨补偿策略

低地位群体倾向于将内群体感知为热情群体,高地位群体倾向于将内群体感知为能力群体。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这是一种低地位群体的社会创造策略和高地位群体的慷慨策略,两种路径会补偿产生作用和互补性。群际补偿是增强自尊的一种方式,补偿提供一种表现出非歧视的手段。高地位群体的慷慨策略显现在避免刻板印象威胁的社会规范,避免带有“歧视”标签。Yzerbyt 和 Cambon(2017)发现

补偿中的创造性策略对于高地位群体并无效果,其原因在于高地位群体因为其拥有足够的声望与资源而很少会出现因自尊而产生的威胁。但是当其拥有稳定的社会资源后,愿意寻找一些慷慨空间给予外群体,愿意做出补偿,以便降低冲突,当然这种优势的承认一定不能威胁到他们的传统地位。慷慨策略是高地位群体感知到优越后为了避免歧视压力而展现出的补偿策略,相关研究都证明了慷慨策略是一种囿于社会规范而产生的补偿效应(Cambon et al., 2015; Cambon & Yzerbyt, 2018)。

无论是低地位群体的社会创造策略,还是高地位群体的慷慨策略,都从群际补偿效应出发,以群际和谐为基准点,使得群际双方在自己地位上感到满意,同时因补偿效应在另外维度上获得了平衡。对于低地位群体而言,补偿是增强自尊的方式;对于高地位群体而言,补偿将体现平等和避免歧视的刻板印象威胁。低地位群体在能力维度上无法抗衡其他群体,因而在另一维度,如温暖维度中获得平衡。Spencer - Rodgers 等(2016)的研究证明了创造性策略对于自尊提升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一个维度的弱点和另一个维度的优势,此消彼长,才能达成平衡。当然,能力维度更为客观和稳定,补偿的目的是合理化,也即维护系统的稳定。当群际地位被认为是合法的情况下,补偿策略才会出现,而群际中一方认为地位不合法或亟待变更时无法采用这一和平策略。尤其是高地位群体认知本群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情况下才使用的策略,才会将群际态度与群际信念合理分离。同时,低地位群体也感知目前形势固化冰封亦或结构稳定,因而也无形中愿意将群际态度与群际信念合理分离,已达求内心平衡。补偿效应显现人们倾向与在某些维度对另一群体消极判断,而在另一维度则对该群体积极判断。当群际边界不可渗透,社会等级制度合法合理时,补偿效应极易出现,这一着眼点从动态视角探讨了补偿效应的产生和存在(Dang et al., 2017)。

4.3 认知差别

认知的视角差别、地位差别、特质差别也是导引分离或耦合的可能性机制。当从观察者角度呈现时喜欢选择温暖维度与否来决策,而当从参与者角度呈现时更多使用能力维度来评价,而女性比男性更注重温暖维度描述群际态度(Wojciszke, 1994)。Hamley 等(2020)发现,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抑也并非是分离的现象,有时也可以耦合,他们用了新西兰毛利人和欧洲人样本,发现在共同的偏见模式背后其动机因身份地位而改变。Wolf(2017)发现,情

感需要 (need for affect, NFA) 的评价标准倾向热情维度, 认知需要 (need for cognition, NFC) 的标准则倾向能力维度。NFA 和 NFC 的研究在群际知觉中发现, 前者更倾向于将热情高 - 能力低的群体刻板化, 后者对能力高 - 热情低的群体比对热情高 - 能力低的群体更青睐。NFA 被认为是人们接近或避免对自己或他人有情绪诱导作用的一般性动机, 比如渴望理解体验他人情绪, 或者厌恶和避免他人情绪。情感需求水平高的人积极寻找并容易沉浸去情绪唤起的刺激或事件。NFA 程度较高的人更容易沉浸在虚构的世界中, 对情绪的总体评价也更为积极。NFC 则是认知倾向, 喜欢完成复杂性任务, 不易受情感倾向, 而受证据影响。也就是说, 情感需求导向的个体偏爱热情群体, 认知需求导向的群体偏爱能力群体。总体来看, 矛盾性的群际态度受到了个体的 NFA 和 NFC 差异的影响。

此外, 建构主义信念 (social constructionist beliefs) 和本质主义信念 (social essentialist beliefs) 的不同也会发生影响。持本质主义信念的观点认为, 差别来自于特质与能力这些不易改变的内容, 而持建构主义观点的则认为种族也是可延展的概念。Kung 等(2018)发现, 社会建构主义信念将有助于促进种族群际间的信任达成, 消解群际冲突。相比较固定化的群际信念, 可延展的群际信念更有助于实现外群体信任, 弥合种族分歧, 促进更多元也更和谐的群际生态。相比较本质主义信念, 社会建构主义信念持有者更容易记忆种族模糊性面孔, 也更少依赖种族典型差异信息 (如肤色) 来进行目标分类 (Gaither et al., 2013; Chao et al., 2013)。也就是说, 社会建构主义对于群际信念可塑性较强, 并不十分僵化, 他们更愿意接纳与包容, 更致力于打破群际界限, 更愿意发起群际接触, 展现更热情与更积极的一面, Halperin 等(2011)关于以色列 - 巴勒斯坦冲突正说明了这一问题。群际本质主义信念和反本主义信念, 其区分在于是否具有先验性, 其信念是封闭、僵化、独断还是灵活、流动、可变。

5 理论展望与干预路径的进一步思考

群际问题是当前国内外统一面临的重大问题, 无论是国家的对峙、民族的冲突还是种族的撕裂、阶层的分化都涉及到复杂的群际问题。因此无论是现实中的重大命题还是理论视野中的亟待突破都需要从群际视角加以学理探讨。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作为群际理论的突破口助益于对群际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细化分析, 两者概念具有共同要素重叠, 其内在有着深刻关联的同质性和共同性, 但是又具有

不同的理论意涵和要素边界, 清晰厘清其耦合和分离中的理论路径才能有助于对群际问题做清晰的回答。此外, 内隐态度和内隐信念均被认为可以有效预测群际歧视, 由此改变内隐群际态度和内隐群际信念一直以来常被认为是歧视与偏见的干预途径。如果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而耦合的, 则干预需要统一策略, 而如果被证明两者之间在某些条件下有可能分离, 则无形中提供了双重路径, 或两套独立的干预系统。那么, 如何改变内隐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呢, 其出路何在?

首先, 群际信念与文化规范和知识信息有关, 由此可以择群际信念的改变为视角。Glaser 和 Knowles(2008)认为, 美国白人对非裔美国人的内隐态度来自于危险预测, 对亚裔美国人的消极内隐态度与缺乏亲和有关, 这是来自不同的信念路径。Dixon 等(2020)发现, 通过 GPS 定位系统研究居民空间地理, 发现难于接触的原因并非外在条件, 而是内在的象征性威胁, 以及在线中的符号互动威胁等。虽然群际接触可以减少偏见, 但是接触主要局限于隔离化制度和隔离化氛围, 在居住、教育、职业中都受到系统化区隔的影响, 因而态度的改变可以从信念的改变出发。另外, 偏见行为通常被认为来自偏见态度, Carr 等(2012)通过 8 项实验发现, 大多数群体成员基于偏见信念而产生偏见行为, 固化的偏见信念使人们减少对他群体的关注, 也容易降低跨种族交往的兴趣。其中, 接受固化信念教育的白人与黑人交往会表现出更不友好, 更焦虑, 而接纳延展信念 (beliefs about malleability) 的白人则并不会出现该情况, 由此可以发现, 减少偏见可以从改变信念的角度入手。

其次, 社会认知的双过程, 即外显和内隐存在分离, 由此通过群际态度的路径出发, 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双向因果关系, 也为态度和信念殊途同归式的改变提供了证据。群体情绪可以影响群体成员行为和群际关系, 由此可以建议通过调节外群体成员情绪来达成内群体目标, Netzer(2020)称其为“群际情绪规范动机”(motivated intergroup emotion regulation), 研究者通过 4 个实验发现, 对外群体成员的恐惧或平静感知影响到内群体的威慑与和解目标, 也就是说, 群体情绪可以有效塑造群际关系, 影响群际行为。Kurdi 等(2019)发现通过操纵评价学习可以影响内隐群际态度, 同时内隐群际信念也有显著差异, 即内隐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的因果关系中当关于特定语义的信息不出现或不存在时, 内隐群际态度可以驱动内隐群际信念。另外, 主我分享 (I - sharing)

即个人与个人之间分享主观经验可以有效改善群际关系,提升对外群体成员的喜爱程度,促进对外群体的积极态度,也可以改变对外群体成员的固化信念(Pinel et al., 2018)。

当然,群际态度尤其是内隐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都是十分复杂的概念,显现了复杂的心理机制,在影响与干预的过程中,存在可能性的陷阱。

一是群际态度的研究相当复杂,其原因在于群体间的实体性、同质性、异质性、边界渗透性等,同时还受到对群体中共同刻板印象的认知与判断。这就说明,从人际知觉到群际知觉跳跃性很强,从人际知觉直接外推至群际知觉的做法也可能存在很大漏洞。

二是群际信念可能受到个体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如观察模型的不同倾向、发展性经验、社会结构、背景文化(Kung et al., 2016),乃至情境线索。例如,有研究发现,拥有地位合法性信念(status-legitimizing beliefs)则坚持系统与等级公正,致力于维护现状,而不易改变社会态度(Wellman et al., 2018)。由此可以发现,群际信念种类繁芜,对群际态度的影响可能更为复杂。况且,群际偏见从基本认知过程和信息生态结构视角被认为少数族裔或外群体均被感知为新异群体,与本群体相区别,自动提取群体信念为负面和消极属性(Alves et al., 2018),因而寻求解决之道需付出更大的勇气。

三是群际态度与群际信念宏观静态、微观动态,简单从路径中剖析其耦合或分离的机制相对困难,如果耦合其内在机制如何,如果分离是否已然有重叠,这些都依赖后续的研究做更为细致的讨论。

参考文献

- Ahmed, S., Blirtel, M., Pyle, M., & Morrison, A. (2020). Stigma towards psychosis: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rejudice, stereotypes, and discrimination in White British and South Asians.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0(2), 199–213.
- Alves, H., Koch, A., & Unkelbach, C. (2018). A cognitive-ecological explanation of intergroup bias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9(7), 1126–1133.
- Cambon, L., & Yzerbyt, V. Y. (2018). Two routes toward compensa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echanisms of compensation for high- and low-status group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7(7), 24–35.
- Cambon, L., Yzerbyt, V., & Yakimova, S. (2015). Compensation in intergroup relations: An investigation of its structural and strategic found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4(1), 140–158.
- Carr, P. B., Dweck, C. S., & Pauker, K. (2012). “Prejudiced” behavior without prejudice? Beliefs about the malleability of prejudice affect interra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3(3), 452–471.
- Chao, M., Hong, Y., & Chiu, G. (2013). Essentializing race: Its implications on racial categoriz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4), 619–634.
- Dang, J., Liu, L., Liang, Y., & Ren, D. (2017). Expected hierarchical integration reduces perceptions of a low status group as less competent than a high status group while maintaining the same level of perception of warmth.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1), 1–11.
- Dixon, J., Tredoux, C., Davies, G., Huck, J., Hocking, B., Sturgeon, B., Whyatt, D., Jarman, N., & Bryan, D. (2020). Parallel lives: Intergroup contact, threat, and the segregation of everyday activity spa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8(3), 457–480.
- Gaither, S., Schultz, J., Pauker, K., Sommers, S., Maddox, K., & Ambady, N. (2013). Essentialist thinking predicts decrements in children’s memory for racially ambiguous fac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0(2), 288–482.
- Glaser, J., & Knowles, E. (2008). Implicit motivation to control prejudi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1), 164–172.
- Halperin, E., Russell, A., Trzesniewski, K., Gross, J., & Dweck, C. (2011). Promoting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by changing beliefs about group malleability. *Science*, 333(9), 1767–1769.
- Hamley, L., Houkamau, C. A., Osborne, D., Barlow, F. K., & Sibley, C. G. (2020). Ingroup love or outgroup hate (or both)? Mapping distinct bias profiles in the popul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6(2), 171–188.
- Heinze, J. E., & Horn, S. S. (2009). Intergroup contact and beliefs about homosexuality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8(7), 937–951.
- Kung, F., Chao, M., Yao, D., Adair, W., Fu, J., & Tasa, K. (2018). Bridging racial divides: Social constructionist (vs. Essentialist) beliefs facilitate trust in intergroup contex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4(1), 121–134.
- Kung, F., Eibach, R., & Grossmann, E. (2016). Culture, fixed-world beliefs, relationships, and perceptions of identity chang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7(7), 631–639.
- Kurdi, B., Seitchik, A., Axt, J., Carroll, T., Karapetyan, A., Kaushik, N., Tomezsko, D., Greenwald, A., & Banaji, M. (2019).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and intergroup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74(5), 569–586.

- Kurdi, B. , & Banaji, M. R. (2017). Repeated evaluative pairings and evaluative statements: How effectively do they shift implicit at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46(2), 194–213.
- Kurdi, B. C. , Mann, T. , Charlesworth, T. , & Banaji, M. (20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icit intergroup attitudes and belief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13), 5862–5871.
- Netzer, L. , Halperin, E. , & Tamir, M. (2020). Be afraid, be very afraid! Motivated intergroup emotion regul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6(11), 1956–1613.
- Pinel, E. C. , Long, A. E. , Johnson, L. C. , & Yawger, G. C. (2018). More about when I's meet: The intergroup ramifications of I-shar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4(11), 1601–1614.
- Spencer – Rodgers, H. , Major, B. , Forster, D. , & Peng, K. (2016). The power of affirming group values: Group affirmation buffers the self-esteem of women exposed to blatant sexism. *Self Identity*, 15, 413–431.
- Wellman, J. D. , Wikins, C. L. , Newell, E. , & Stewart, D. K. (2018). Conflicting motivations: Understanding how low – status group members respond to ingroup discrimination claiman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5(8), 1170–1183.
- Wohl, M. , Chen, C. , Halperin, E. , Caouette, J. , Hayes, N. , & Hornsey, M. J. (2015). Belief in the malleability of groups strengthens the tenuous link between a collective apology and intergroup forgive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5), 714–725.
- Wojciszke, B. (1994). Inferring interpersonal attitudes: Hypotheses and the information-gathering proces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4(3), 383–401.
- Wolf, L. J. , vonHecker, U. , & Maio, G. R. (2017).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orientations in intergroup percep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6), 828–844.
- Yzerbyt, V. , & Cambon, L. (2017). The dynamics of compensation: When ingroup favoritism paves the way for outgroup prais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5), 587–600.

Intergroup Attitude and Belief: Coupling or Separation?

Guan Jian Fang Hang Zhao Li Chen Shuyu

(Zhous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s, the study of social cognition, in particular the study of attitudes and beliefs about groups has been dominated. Intergroup attitudes are generalized valence attributions to social groups, whereas intergroup beliefs are specific trait attributions to social group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intergroup attitudes and beliefs are coupled, interactive and interdependent. However,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whether and how the separation changes between the intergroup attitudes and beliefs. The reasons for the separation include cultural stereotypes, compensatory effects and cognitive differences.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mainly occurs in relation to two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social judgment. Compensation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a social creativity strategy to re-establish positive social identity for low – status groups and as a magnanimity strategy to maintain positive social identity for high – status groups. The present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are separations between intergroup attitudes and beliefs. Overall, these studies provide valuable evidence by using two ways to intervene the intergroup relationship.

Key words: intergroup attitude; intergroup belief; coupling; separation; compensation effect